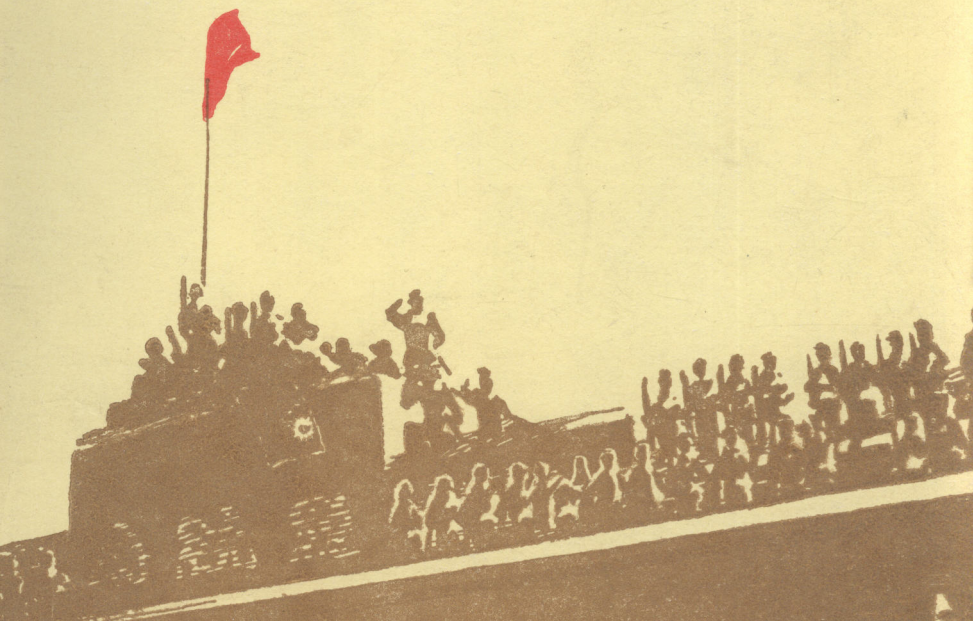


南京党史資料

3
总第十四辑

1986



南京党史资料

一九八六年第三辑

(总第十四辑)

中共中央南京局、中共代表团资料专辑

中共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办公室

南 京 市 档 案 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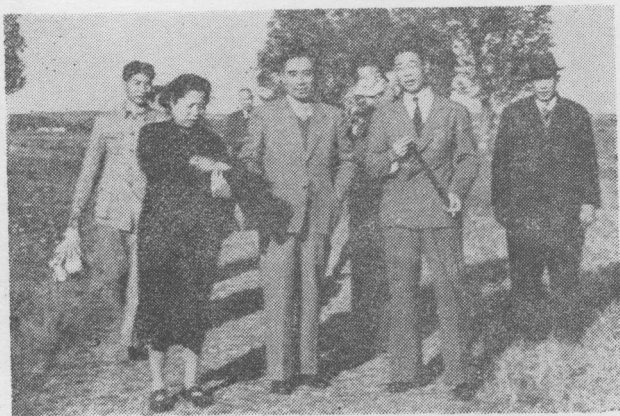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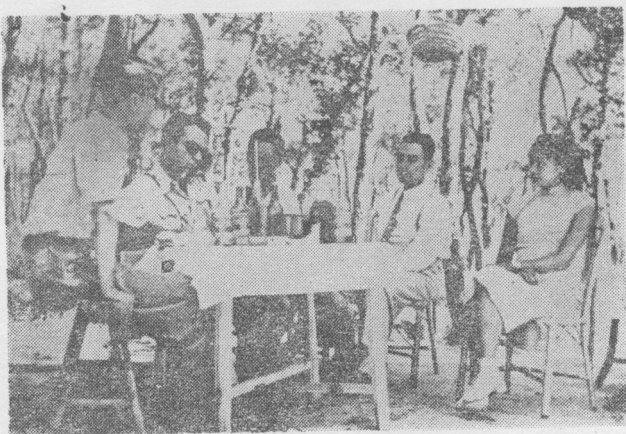
一九八六年七月



周恩来在南京梅
园新村办公。



周恩来在南
京灵谷寺树林中
接见美国《纽约
时报》驻南京记
者李勃曼。右起
吴青、周恩来、章
文晋、李勃曼、
吴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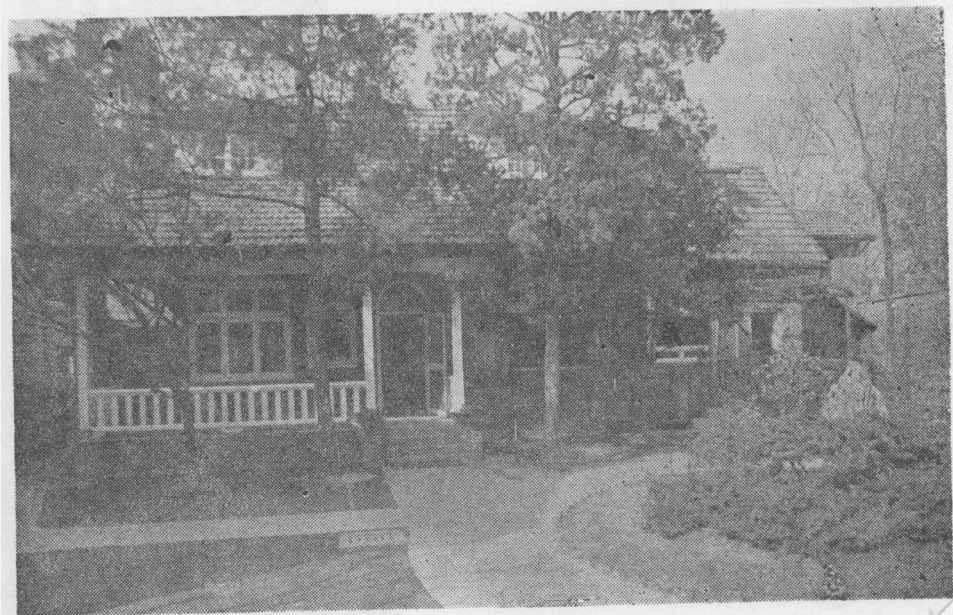
一九四六年周恩来、
董必武、李维汉、邓颖超、
梅益等同志游玄武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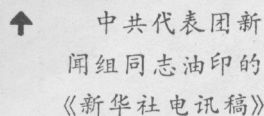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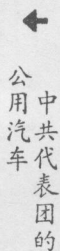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
十九日，周恩来(右一)、
邓颖超(右二)、李维汉
(右四)奉命回延安，行
前与留在南京工作的董
必武(右三)合影留念。



梅园新村三十号庭院



↑ 中共代表团
在南京注册
成员的户口卡
(部分)



编 者 的 话

一九四六年五月至一九四七年三月，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中共中央南京局）在南京谈判中，与美蒋反动派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了他们反共反人民的倒行逆施，使他们陷于被动孤立的地位，使我党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世界舆论的同情与支持，这对扩大革命统一战线，扩大党的影响，推动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运动，配合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为了纪念中共代表团的这一段光辉的历史，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精神和我党光荣的革命传统，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办公室和梅园新村纪念馆合编了这本专辑资料。当时中共代表团在南京进行革命活动的历史资料十分丰富，我们选用了部分资料，欢迎当年的老同志和广大读者给我们批评指正。

目 录

编者的话

· 文 献 资 料 ·

周恩来致钱大均函（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一日）……………（1）

周恩来致蒋梦麟函（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2）

· 回 忆 录 ·

南京谈判与统战工作……………李维汉（3）

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代表团在南京的一些情况……童小鹏（9）

南京局外事委员会简况……………王炳南（18）

跟随周恩来同志参加停战谈判……………章文晋（22）

回忆我在梅园的工作……………梅 益（27）

在南京筹办《新华日报》……………石西民（30）

战斗在梅园的日日夜夜……………杨兆麟（34）

上海办报始末·····	徐迈进(44)
在周副主席身边工作的一段经历·····	宋黎(50)
重庆——南京——延安·····	王华生(57)
梅园杂忆·····	康光祥(60)
电波频传·····	刘澄清(65)
关于南京局青年组若干情况的回忆·····	朱语今(69)
中原突围的前前后后·····	方敏(78)
中共代表团营救我出狱的经过·····	杜大公(84)
中国妇女联谊会南京分会的活动·····	林琼(91)

· 缅怀战友 ·

纯金的方向盘

——悼战友段廷英·····陈舜瑶(98)

· 专题综述 ·

中共代表团在南京的谈判工作·····梅园新村纪念馆(105)

· 革命遗址介绍 ·

梅园新村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中共中央南京局)

办公原址·····梅园新村纪念馆(121)



周恩来致钱大钧函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慕尹①市长先生勋鉴：

睽违数月，驰念时深，政协圆满成功，大局至堪庆幸，想革命旧游，定当同此欣喜。

兹有愚者，新华日报自始随国都播迁，由宁而汉，由汉而渝，现国府还都在即，新华日报理应追随东下，因特派该报社长潘梓年君先行来沪筹备出报事宜，并嘱其趋前奉候，藉聆教益，至祈不吝指示，俾得知所遵循，实为至幸。井井端白，敬颂公安不一。②

弟周恩来(印)于二月二十一日

【注】

① 慕尹，即钱大钧，时任国民党政府上海市长。

② 信中标点为编者所加，下件同。

周恩来致蒋梦麟^①函

(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

梦麟先生勋鉴：

恩来昨日抵京，尚未趋候，比维道履清吉为颂。兹有恳者，敝代表团人员陆续来京，前由市府所拨梅园新村房屋两幢尚感不敷；现有中山东路一四九号楼房四间亦系封存敌产，拟请拨予暂住，以解决目前困难。再者，前曾请求拨中山东路一四七号为新华晚报社之用，亦尚未见覆示。以上统祈鼎力多加协助，俾可从速解决。费神容俟面谢。兹由敝处石西民同志前往晋謁，即希惠予接见赐教，无任感禱。专肃敬候
勋 安

周恩来(印)谨启

五月四日【书】

【注】

① 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

南京谈判与统战工作

李维汉

南京谈判是重庆谈判的继续。蒋介石为什么邀请毛主席到重庆去谈判呢？因为解放区的力量壮大了（解放区有一亿人口，一百万军队，这是我们可以与国民党对等谈判的主要力量），国际国内的舆论都希望和平，特别是广大人民希望和平，他当时不得不谈。蒋介石妄想通过谈判达到三个目的：一、欺骗人民；二、争取时间，准备内战；三、签订一个有利于他的条文，套住我们。当时有些人对蒋介石还有幻想，把实现和平民主的希望寄托于他。他也利用这一点，并放出谣言，说共产党不要和平。我们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为了争取和平、民主，为了打破蒋介石的谣言，揭露他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毛主席亲自到了重庆。在谈判中，我们作了某些让步，签定了“双十协定”。后来周恩来同志率领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签订了一个停战协定，又经过有第三方面参加的政协会议，制定了一个政协决议，这是在重庆。

蒋介石同意停战，主要是因为他对内战还没有准备好。到南京后，他已把大城市都拿到手了，又有美国支持，便气势嚣张，妄图用武力消灭我们。因此，那时的谈判，主要是破坏与反破坏的斗争：蒋介石要破坏停战协定，破坏政协决议；我们则坚决维护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这个斗争是全国范围的，不仅是在南京。

停战是军事三人小组的事，第三方面没有参加。但涉及到政治问题，就有第三方面了。

有了军事三人小组；后来又有了一个非正式的五人小组，这是为了商谈政治问题，由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提出来的。司徒雷登是燕京大学校长，有很多学生，在中国有欺骗性，以罗隆基为代表的一些人对他抱很大幻想。

我们在南京谈判中，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是作了某些让步的。那时蒋介石在军事上处于优势，我们处于劣势，为了争取和平，教育群众，有限度地作了某些让步，但根本利益是不放弃的。人民的一支枪，一粒子弹都不交给他。我们同蒋介石的每一次斗争，都进一步揭露了他，使全国人民更清楚地看到我们要求和平是真诚的，而蒋介石的侈谈“和平”则是虚伪的，只是掩护进行内战的烟幕，这样就教育、争取了人民，孤立了国民党反动派。

由于国民党的破坏，谈判越来越困难了。为了表示抗议，周恩来同志九月间到上海去了，邓颖超和我都已先去了上海，第三方面人士也到上海去了。

关于第三方面，这是中间势力，主要代表城市中等资产阶

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他们人数不多，但社会联系广泛，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方面都在争取这个势力。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关于民主党派曾说过这样的话：每个党派看起来只是几根头发，但背后拖着一大把头发。上层的左、中、右，反映着下层的左、中、右，面上是几个人，但代表一大批人，我们直接争取的对象主要是他们。谁争取了中间势力，谁就不孤立。

抗战时期，毛主席在论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时指出：三次关门主义都是对中间势力不作阶级分析，统统加以反对。还指出历史上的“左”倾机会主义是一切斗争，否认团结；右倾机会主义是一切团结，否认斗争。中间势力的特点就是动摇，他们有革命性，又有妥协性，毛主席提出的政策是又团结又斗争。这样就正确地解决了同他们联合的问题，即以斗争的手段，达到团结的目的。批判他们是为了团结他们，过分的斗争会把他们推到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方面去，所以要耐心地工作。

第三方面的一个主要力量是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以张澜为主席的民盟是几部分力量组织起来的。有沈钧儒为首的救国会，黄炎培为首的职教社，章伯钧为首的农工民主党，梁漱溟为首的乡建派，还有一批无党派知识分子。至于张君勱为首的民社党和曾琦为首的青年党，则先后投到蒋介石方面，从民盟中被清除出去了。

第三方面还包括社会贤达，如参加政协的代表郭沫若、李烛尘、缪云台、王云五等。

当时的第三势力，还有马叙伦、周建人等为首的中国民主促

进会，黄炎培、胡厥文为首的中国民主建国会，许德珩为首的九三学社。除黄炎培以民盟身份参加了旧政协外，这些组织都没有参加旧政协，但他们进行的政治活动，对争取和平、民主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还有一些国民党的民主势力，如李济深为首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当时还未正式成立组织）；蒋光鼐、蔡延锴为首的国民党民主促进会；陈铭枢为首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王昆仑、许宝驹为首的国民党民主革命同盟等，它们当时是秘密的，但这些组织的成员也以个人身份做了许多工作。

第三方面要和平、要民主、要自由，多数人怕打仗，怕分裂。毛主席一九四六年八月同斯特朗谈话后，民盟罗隆基等几个人到梅园找我。罗隆基说，毛主席讲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这太刺激了。美国人脾气大，触了他，一发脾气，踢你一脚，受不了。这反映了他们怕美帝，怕内战的恐惧心理。第三方面政治上有左、中、右，左派靠拢共产党，右派靠拢蒋介石，中间派动摇于左右之间。最后，在参不参加伪国大这场斗争中分裂了，主要是民社党、青年党和社会贤达中的几个代表投向了蒋介石。

各党派在上海都有房子，互相往来，周恩来和我们在上海时，利用这个机会对各党派作了工作。

十月十一日，蒋介石的军队占领了张家口，同一天，他又宣布如期召开一党包办的御用国大（七月四日，他未经协议便片面宣布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大，当时我方及民盟都声明这违反政协决议，加以反对）。为了再一次搞和平欺骗，他派了邵力子、

吴铁诚、雷震到上海，自称是“肉请帖”，请中共代表团和第三方面代表回南京继续谈判。对于继续谈判，我们已很清楚不会有什么结果了，但第三方面有些朋友仍存有幻想。为了继续揭露蒋介石的反动和欺骗，我们同意回南京。行前，我对周恩来同志说：“这次去南京，接着就是回延安，谈判本身不会成功，但我们是胜利了，将满载着全国人心回去，这是很大的胜利。”周恩来同志说：“对！”

十月二十一日，我们同第三方面代表一起回到南京。蒋介石在接见后马上飞到台湾去了，这表明他并无诚意。孙科请吃饭的时候，梁漱溟发表了讲话，他说：“回来是回来了，中共下一步是回延安，现在是死马当活马医。”在以后的斗争中，我们坚持要首先停战，第三方面也居间“调停”了几次。蒋介石最后提出和坚持八项无理条件，并要挟我党先交出参加伪国大的代表名单再停战。谈判已经到了破裂的边缘，第三方面一部分人提出一个所谓的折衷方案。折衷方案完全是投降，这是梁漱溟为主搞出来的。本来第三方面同中共有约在先，双方有什么新的打算要互相打招呼，这次却不同我们商量就把折衷方案分别送给了马歇尔和国民党代表。当梁漱溟等人把方案送给我们时，我们看了非常气愤。周恩来同志痛斥他们背信弃义，说：“合作了这么久，这样大的事情竟不同我们商量就送去了。你们不想想，这个投降方案明天报纸上登出来，你们把自己放到哪里去？你们怎么下台？”他们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分别赶到马歇尔总部和孙科那里要回了那个方案。

民盟不参加伪国大，张澜先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当时在

重庆，吴玉章同志同他商谈之后，他便打长途电话，要民盟不参加。李烛尘参加是为了照顾他的具体困难。至于其他人，在伪国大召开后就分道扬镳了。

谈判决裂后，一部分民主人士来梅园告别，周恩来同志同他们谈了许多话，最后说：“我们回去穿起草鞋再打十年，胜利一定属于人民。”十一月中旬，周恩来、邓颖超和我回延安，董老留在南京。有新闻记者在场问我：“何时再来南京？”我答：“南京，我们总是要来的，何时再来说不定。”

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代表团

在南京的一些情况

童小鹏

我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到南京，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十一月底撤离南京。一九四六年六月我又到南京，在中共代表团工作，次年三月七日和董老、钱之光等被迫撤回延安。在南京的这两段时间都是几个月，时间不长，当年在周恩来同志和董老的领导下工作，终身难忘。

由于我们党的努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我认为第一个办事处是在西安，不是南京。因为西安事变以前，我们就派了刘鼎同志在张学良处建立了秘密电台，一九三六年四月，周恩来就在延安与张学良进行了密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又处理了二月二日东北少壮派杀死王以哲的事件，西安的局面才稳下来。国民党派张冲到西安与周恩来同志谈判，三月，恩来同志到杭州谈判，七月又与林伯渠、博古同志到庐山与蒋介石谈判。八月初，国防会议通知了中共方面朱德总司令和叶剑英参谋长参加，朱、叶